

· 金 涛 ·



Jingji banyu

浪迹天涯

· Jin Tao ·



浪迹天涯

金涛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殷崇文

浪迹天涯

金涛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960毫米1/32开，印张11.25，插页2，字数189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 7-80041-046-3/G·44

统一书号：7363·126 定价：(平装)1.80元，(压膜)2.00元

编者献辞

将凝聚着无数心血的《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第一辑)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兴奋、欣慰与期望。

将来,无论谁来书写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不能不赋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期以辉煌的文字。

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复兴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是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新旧观念更新的蜕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和可歌可泣的奋斗!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比历史学家们更早地记录了这一切——我们感到兴奋!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记者,他们一步入新闻界就赶上了这个历史新时期。如果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那么,20世纪便是新闻记者的时代。这批记者活跃在突发事件的现场、重大事件的舞台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记录下新时期的风云变革和各种社会问题,记录下改革大潮中中国人民的开拓与追求。

这种记录是那样艰难。传统的新闻写作格式已容纳不下时代的风云和他们的激情。于是这批记者调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使真实的新闻报道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富于艺术感染力。他们的作品以记实的优势兼有文学的价值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整个社会的注目。所谓“新闻作品枯燥乏味，不值得结集出版”的说法，因此而被否定。应该指出，这批新时期的记录者是和历史一同前进，一同成长的——我们深感欣慰！

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在改革中涌现出来，以其好的作品加入这套丛书的行列，奉献给现在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我们期待着！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夏于北京

目 录

改革篇

- 安徽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1)

人物篇

- 要让科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27)

——记物理学家严济慈

- 为了四个现代化的明天 ……(64)

——记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谢希德

- 夏鼐的足迹 ……(80)

- 他拥抱着南极……(118)

——记海洋生物学家吴宝铃

- 王光英的闪电战……(131)

- 五十八勇士……(141)

- 病房静悄悄……(158)

- 理想之歌……(165)

——记武汉军区总医院主治医生唐镜波

南极篇

- 啊，南极洲……(177)

- 他们是开拓者……(199)

- 现在可以说了……(220)

长城站巡礼·····	(236)
伟大的第一步·····	(243)

浪花篇

海底森林·····	(265)
——海南岛考察散记(一)	
“见血封”喉和“海南植物王”·····	(271)
——海南岛考察散记(二)	
雾啊，西双版纳的大雾·····	(278)
在细菌杀人工厂的废墟上·····	(285)
——访日本“七三一部队”遗址之一	
鼠疫的灾难·····	(291)
——访日本“七三一部队”遗址之二	
地震，明天能准确预报吗？·····	(296)
从海峡那边吹来的风·····	(302)
——记白少帆纵谈“琼瑶热”	
帅克给话剧舞台带来了什么·····	(307)
——记林兆华谈布莱希特	
打开音乐殿堂的金钥匙·····	(311)
——记薛金炎谈《音乐博览会》	

海外篇

麦哲伦海峡散记·····	(315)
巴黎风情·····	(325)
秘鲁斗牛目击记·····	(348)
后记·····	(354)

改革篇

安徽滁县地区

“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

一、后杨村的笑声

我们乘坐一辆面包车，在秋光明丽的原野上马不停蹄地跑了10天，行程2000余里，访问了安徽滁县地区7个县的广大农村。

一个天高云淡的午后，我们穿过稻香扑鼻的晒谷场，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西孙大队后杨村一户农舍房前。从这里远眺，越过平坦的田畴，是座落在凤阳山麓的巍巍皇陵，那石人石马拱卫的树木葱茏的岗阜，埋葬着朱元璋父母的遗骸。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皇家的风水之地并没有给朱元璋家乡的老百姓带来一点好处。在后杨村，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后杨地多不打粮，滚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后杨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后杨。”——原来，在1979年以前，这个仅有23户人家的村子，除了两名共产党员慑于组织纪律没有外出逃荒外，所有的人，不

论男女老少，年年都不得不为生活所迫，到外乡逃荒要饭。“用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就是后杨村当日面貌的写照。最为可叹的是，在人口学家惊呼农村人口爆炸的今天，这个贫穷的村庄由于光棍娶不起老婆，姑娘纷纷外嫁，多少年来人口反而下降了。

“喂，同志，吃花生哪！”说话的是后杨村的冒尖户、多种经营的能手杨锦礼。他笑呵呵地炒了一大簸箕新收的花生，一面招待我们，一面给我们讲起他二进合肥的故事。

47岁的杨锦礼逢人就讲起他两次进合肥的难忘经历。1967年，杨锦礼因为家里断了粮，揭不开锅，带着孩子跑到合肥沿街乞讨，过着屈辱的流浪生活。去年秋天，杨锦礼二进合肥了。这次，他没有挎讨饭篮，而是里外一新，欢欢喜喜，带着他几年来努力生产夺得丰收的捷报，出席了安徽省多种经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这前后的变化，正象杨锦礼所说的：“我第一次到合肥是流落街头，第二次是高高兴兴住高楼，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啊！”

杨锦礼接着捏着指头，笑逐颜开地向记者透露了他家今年的收入账：他种的25亩小麦收了1万3千斤，18亩水稻收了1万6千斤，此外还有2800斤黄豆，1万2千斤春山芋，350斤高粱，仅粮食一

项折合3万7千斤。加上瓜，油菜籽，芝麻，猪，家禽等，全家8口人纯收入达9000元。他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为了向党的十二大献礼，他卖了1万斤余粮，支援国家建设。

生产发展，温饱解决，农民迫切希望和那充满晦气的草房告别了。杨锦礼一家不久也要高高兴兴迁居了。这是式样美观、舒适实用的楼房，砖石结构，楼下3间，楼上两间，每间18平方米，外带阳台，墙外有楼梯可通楼上。令人高兴的是，这个二十三户人家的村庄，目前已有16户筹集资金，兴建和杨锦礼的新居一模一样的小楼，眼下只待破土动工了。

其实，后杨村在短短几年靠劳动致富的人家并不是杨锦礼一户。34岁还没有娶媳妇的队会计杨锦贤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该村540亩地，打粮食最多的1977年，总产不过9万6千斤。1979年实行包产到组，情况起了变化，产量上升到17万斤，1980年又增加到22万斤。这年秋天实行“包干到户”，1981年产量一下猛增到36万5千多斤，今年预计不少于42万斤。单是卖余粮一宗，全村平均每人超过1吨。他还告诉我们，这几年，这个年年逃荒要饭的村子添了缝纫机、自行车各14台，手表19只，每户一台收音机，至于生产上必需的耕牛、犁耙、平板车等也大为增加了。

“现在光棍汉还找不到媳妇吗？”我们笑着问杨锦贤。

他说：“全村17个光棍汉，已经有6个娶了媳妇成了家……”

“那么，你呢？”

杨锦贤涨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答道：“快了……”

所有的人都笑了，农民们笑了，干部们笑了，连我们来采访的记者也笑了。

的确，在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听到多少这样发自内心的朗朗笑声，笑声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信心、喜悦和希望，同时也饱含着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无限感激。多少年来被贫困、债务和种种忧虑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农民，他们脸上和心头笼罩的愁云一扫而光，再也看不见了。

行署专员、凤阳县委第一书记陈庭元对我们说：“凤阳县的每一个角落，你们都可以去看，对前来参观的外宾，我们也是这样讲的。我们没有参观点，也不搞什么点。尽管各个地方变化的程度不同，但是实行大包干给凤阳带来的变化，却完全是事实。”情况确实如此，大包干以来凤阳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从土改到初级社，凤阳的农业生产是迅速发展的。从那以后的20多年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成了全国出名的“三靠县”（即用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出外逃荒要饭的，最多

的年份达到二三万人。从1956年至1978年国家购粮9.6亿斤，返销粮却有13.4亿斤。可是，大包干的实施带来了奇迹，长期无法遏止的恶性循环得以扭转。1979年吃返销粮的不光彩的历史结束了，不仅家家有余粮，户户粮囤满，还卖给国家粮食9400万斤。1980年上升到1.15亿斤，1981年猛增到2.35亿斤，今年是2.5亿斤。凤阳粮食产量最高的是1977年，3.6亿斤，今年翻了一番，7.15亿斤。农民的人均农业收入(不包括家庭副业收入)也从1978年的61元增加到今年的350元。

数字是枯燥的，但有时候却比最优美的旋律还要富有魅力。这几年，凤阳全县的农户增添了2200台手扶拖拉机，3万头耕牛，5万辆平板车，盖了4万多间砖瓦房，此外还购买了2万辆自行车，2万台缝纫机，1100台电视机，7万台收音机。依靠国家、集体和农民筹资，架设了460公里输电线，铺了310公里沙石公路，修建校舍1800间，30个公社盖起礼堂，修筑了29个电站……说到这里，陈庭元颇动感情地说：“过去想办的事，一是没有钱，二是群众没有积极性，现在有钱也有积极性。我们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乡。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搞上去的。”

凤阳是一面镜子，它真实地反映了“大包干”给滁县地区的面貌带来的巨大变化。

二、闪光的心灵

在定远县一泓碧波的水库附近，我们饶有兴趣地走访了养鱼能手王家斌。这个精明能干的中年农民是远近有名的养鱼行家，据说他不用下水，只要朝湖塘水库里扔一块小石子，光听水响就能知道哪儿有鱼，有多大，是什么鱼。可是在吃大锅饭，干活“大呼隆”的年月，身怀绝技的王家斌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生产队的水塘水面多的是，宁可死水一潭，任其淤积长草，却不许发展水产。于是，人穷志短的王家斌，每当家里揭不开锅时，便到毗邻的解放水库去偷鱼。

实行大包干后，王家斌和生产队签了合同，承包一口废弃多年、草深水干的荒塘，经过一番整理，放水养鱼。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夫妻俩精心管理，当年收获鲜鱼800多斤，这是1980年的事。这几年，王家斌承包了更大的水面，成了向水中求财，3年跨入小康行列的冒尖户。

在“养鱼热”的情况下，王家斌并没有为了个人利益而拒绝别人的求援，也没有把自己的养鱼技术视作私有财产，相反，他主动联系了本村的十几户人家，把所有的荒废水面全部利用起来养鱼，还成立养鱼辅导小组。旁人没有技术，他负责传授；有

的户没有鱼苗，他主动支援。有一次，一位80多岁素不相识的老汉从十几里以外赶来，请王家斌给他当参谋。王家斌丢下自己家里的活计，立即赶到老汉所在的村子看塘口，告诉他该下什么鱼种，怎样下饵料，如何管理。外地有人来信询问养鱼要领，他有信必复，把自己的技术和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所有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光是回信，他一次就买了40个信封哩！

当我们听说王家斌每年都把他收获的鱼的大部分按平价卖给水产公司，而没有统统拿到市场上自行出售，仅这一项就减少收入上千元时，我们问：“老王，你这样做是怎样想的呢？”

王家斌腼腆地笑了笑，说道：“没有党的好政策，我王家斌纵有三头六臂还不是个穷光蛋，我怎么会忘记国家呢”。他顿了一下，又说：“党的政策是叫大家都富起来，我想，我一家富还不行，还得穷帮穷，帮助大家都过上富日子。”

在天长县，我们沿着芦花夹道的高邮湖大堤，来到被誉为“文明村”的界牌公社沙湖大队的小王庄。一进小王庄，一眼就看见一户人家正在盖房。七八个农民在房顶上檩铺瓦。一打听，原来这个8户人家的小村，已有6户盖了新房，现在他们正在为另外两家困难户盖房。在小王庄，邻里之间这种团结互助已蔚然成风。农民们说：过去“大呼隆”干

活，人们为贫穷所迫，成天为工分，为干多干少，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嘴斗气。现在大包干，经营分散，人心不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更融洽，更团结了。今年收稻时节，徐庆桃一家的稻谷摊在田里，突然遇到一场倾盆大雨，这时全村的人一起出动，挑的挑，抬的抬，连谷带泥一块儿抢收回来。按说大伙儿给徐庆桃一家算是帮了大忙，可是他们并不这样想，因为稻谷连泥带水地摊在一块，搞不好还要发霉。于是他们一家一户把徐庆桃家的稻谷带回去，用水淘洗干净，然后又晒干，这才把干干净净的稻谷送到老徐家去，使他没受一点损失。

大包干所带来的人们心灵的变化，不仅仅反映在这些平凡的生活琐事上，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在大自然的严峻考验面前，农民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集体，他们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今年，滁县地区赢得了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第四年大丰收，预计粮食产量可达42亿斤，比去年的40亿斤略有增产。但是，今年的丰收却是在战胜了风、雹、旱、涝、病、虫等多种自然灾害后取得的。先是春旱，在最需要雨水的春播时节接连40天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所有的水塘和小水库全部干涸见底。紧接着从7月初起，大雨如注，山洪暴发，全境的大小河流河水猛涨，出现历史上最大的洪水。

维系凤阳、嘉山的140余公里的淮河大堤，在特大洪峰的冲击下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险情。

淮河大堤告急！滁河、襄河、池河等主要河流和28座大中型水库纷纷告急！中共滁县地委当时正在召开常委会，会议立即中断，以地委书记吴炎武为首的领导同志立即连夜奔赴抗洪第一线，指挥抗洪抢险的战斗。

在这紧急关头，千千万万农民并没有顾及自己的一家一户，而是万众一心，在党的领导下，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投入与洪水的搏斗。滁县的红花桥水库由于水位猛涨出现险情，威胁到下游的城西水库以及滁县县城的安全。这时，花山公社魏营生产队的110个青壮农民全体出动，在队长傅克松率领下立即赶赴大坝，和其他队的农民一道，在暴雨中连续干了7天7夜，终于战胜了洪水。嘉山县安淮大队的一位妇女王继云，在抢险关头，丈夫和女儿先后病倒，她便跑到娘家找人来照料家务，自己上堤，加入抢险的行列。太平公社的老农马云龙，老两口年近花甲，可是两位老人仍然领着全家泡在水里抱草护堤。在抗洪抢险的日日夜夜，类似这样的动人事例不胜枚举。淮河岸边成千上万的农民拿出自家准备盖房的木料，甚至门板、被絮，收集大量的袋子、稻草、麦秸，象当年支前大军一样，守护着百里长堤。他们还富有创造性地搞了责任段，把

每家每户的职责分段落实，做到步步为营，分工负责，有效地保护了大堤的安全。

汹涌的洪峰在30万农民组成的抗洪大军的抵挡下，溃然退却了。这一次抗洪斗争的胜利，使人们对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更加增添了信心。如果说那一道雄伟的大堤把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农民的身家性命联系在一起，那么，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就是这样一道无形的长堤，它将把国家、集体和千千万万农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三、心里装着群众

我们采访的最后一站是来安。来安，是新四军当年坚持抗战，浴血战斗的地方。这一带，流传着许许多多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血肉相连的动人佳话。然而，今天我们又耳闻目睹许多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象当年的新四军一样，深入基层，真心实意地帮助那些生产和生活上困难的农户，把党的温暖送到农民心坎上的动人故事。有这样一个例子——这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例而已——1981年夏天，当大包干给西武公社陆巷大队高庙村的家家家户户带来无限喜悦，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个村的农民杜金光却蹲在田埂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又黄又瘦的秧苗，不住地长吁